

## 口語傳播在台灣的挑戰與回應

黃鈴媚\*

### 壹、前言

中國人一向重視正名問題，因為「名不正」便會使得「言不順」，「言不順」則將導致「事不成」。因此，對於全球成立最早（1914）、規模最大的傳播學會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在前年（1997）四度易名，將“speech”字樣從會名上除掉，改為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的行動，身為傳播學者，自不應小覷之。

從相關的討論中（馬成龍，1999；Chesebro, 1996；Craig & Carlone, 1998），不難發現，SCA易名之舉實際上是在美國傳播學領域內部已經發生「量」變與「質」變後，為了使該組織對內、外之代表性名實相符，不得不然的一項措施。根據Craig與Carlone (1998: 70)分析，在美國諸種傳播學次領域中，大學部課程設計不受限於特定媒體或演辯術/語藝學的「一般傳播學」（communication, general）科系，近年來（1992-1993）的成長幅度幾乎已逼近其它傳播學次領域學士學位頒發人數的加總。換言之，愈來愈多的美國大學中，傳播科系的名稱不再於communication前冠上“speech”或“mass”字樣，學生也可以在同一系修到speech communication與mass communication的科目。

對於台灣傳播學界而言，美國所發生的整合趨勢自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因為台灣傳播學領域與美國傳播學領域間存在緊密的互動關係。然而，我個人認為，儘管傳播科系系際整合可能是未來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們必須謹慎地解讀此一趨勢；尤其是當整合的範圍不只是侷限於大眾傳播科系間，而是擴大到speech communication與mass communication（包括journalism）兩個領域時，我們就必須仔細

---

\* 黃鈴媚博士現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副教授兼系主任。E-mail: lmhuang@cc.shu.edu.tw

衡量「可欲性」(desirability)與「可行性」(feasibility)的問題。

換言之，儘管「合」(係指speech communication與mass communication間的整合)有助於整個傳播學門整體性(coherence)與正當性(legitimacy)之建立，但對於一些關鍵性問題，譬如，什麼時候是適當的整合時機(國內傳播學界相關次領域是否已經成熟至足以迎接這個關鍵性時刻)?應該以何種方式進行整合(政大傳播學院之「學程制」、近似美國現況之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的「混合制」或其它可能方式)?都必需經過相關人士長期討論，絕對不能急就章，隨意依樣(美國實例)畫葫蘆。

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個人不贊成系際整合的趨勢(我的口語傳播學術背景很容易讓人產生「本位主義」的聯想)，因為當整合的大勢已形成時，最不智者莫過於逆勢而為。因此，長期而言，雖然「分」並非「可欲」；但在「合」暫時「不可行」時，如何以「分」為「合」之將臨做準備，將考驗許多「口傳人」的智慧。本文僅代表我個人對上述問題現階段的思考結果，希望能發生拋磚引玉的效應，一齊為傳播學學門在台灣未來的發展勾勒壯麗之願景。

首先，我將對SCA易名為NCA之舉以及美國傳播學領域內正持續進行之系際整合，提出我個人的解讀，並嚐試分析這些現象對國內傳播學領域的可能衝擊；基本上，我認為SCA拿掉“speech”字樣，改稱NCA，是一種「化敵為友」的明智之舉，國內傳播學界若能正確解讀此舉背後之含意，將有助於未來的整合發展。其次，再對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應該在課程設計上，如何因應此種外在情勢的轉變，提出一套規畫性藍圖，以就教於國內傳播學界先進。

## 貳、解讀SCA之易名

對於SCA(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易名為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之舉以及美國傳播學領域內正持續進行之系際整合，國內傳播學者解讀這些現象時，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對美國人而言，“speech”一字有很濃厚的文化與歷史意涵。美國大學早期的speech departments冠用“speech”字樣時，主要以該字廣義地囊括所有與口語表達活動相關的教學領域——演說、辯論、戲劇(theater)、語言病理(speech pathology)、文學頌讀(the or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廣播(Delia, 1987:78)；因此有學者主張(馬成龍, 1999:249)，這個階段的speech departments不宜直譯成中文的「演講系」，而應稱之「表達藝術

系」。一直到1950年代晚期至1960年代期間，戲劇與語言病理才逐漸脫離speech departments，各立門戶，在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學門分類中，分屬「視覺與表演藝術」（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學門與「健康專業」（Health Profession）學門；廣播也併入研究媒介傳播為主的「大眾傳播系」（mass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s）。但是，誠如改名前的SCA會長James W. Chesebro (1996)所言，今日的美國人還是很容易將“speech”一字與「語言病理」混為一談，同時卻又很難把“speech”一字與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小團體溝通（group communication）、組織溝通（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健康溝通（health communication）、公共關係等一般人所認知的、較廣泛的傳播研究領域做直接聯想。

其次，我們也必須注意，美國傳播學領域內部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結果。若從NCA這個全球最早、最大的傳播學會幾度易名的時間點來看（Bochner & Eisenberg, 1985），不難發現，每次易名都象徵speech departments一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以我之見，從1914年到1997年間，大略浮現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14-1946）是「草創期」，從最早（1923）將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易名為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後來（1946）又改為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學會名稱一直環繞在“speech”字樣，主要因為在此階段一些擔任演辯技巧課程的教師甫自英文系脫離，自立門戶，尋求定位區隔為當務之急。

第二個階段（1946-1970）是「成長期」，在這個時期，雖然原屬speech department的戲劇、語言病理與廣播陸續脫離，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急速興起、具備濃厚社會科學氣息的「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風潮，在1960年代藉由U. of Illinois與U. of Iowa所培養出來的一批行為科學學派傳播學者之推波助瀾，將原本以實務教學為主的speech departments，擴大至涵蓋人際溝通、小團體溝通與組織溝通等研究領域，進入「技巧」訓練與「學術」研究共存之speech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s新階段（Delia, 1987:80）；因應這些改變，1970年將“communication”納入學會名稱，改為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甚至有學者主張（Wartella, 1994:55），傳播學門是從這個時期起才算是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

第三個階段（1970-1997）中，傳播科系成為大熱門科系，是為「茁壯期」。根據Craig與Carlone (1998:79)的分析，在美國高等教育成長緩慢的1972-'73至1992-

'93期間，傳播學門學士學位（communication bachelor degrees）頒發人數成長幅度（155%）高過其它學門成長幅度（26%），幾近六倍。不過，Craig 與 Carlone（1998, p.74）也特別強調，解讀這些統計數字時必須注意，諸種傳播學門次領域的成長幅度並不一樣，其中尤以一概括性類目——「一般傳播學」（communication, general）——之成長，最為驚人，也最值得注意；相對地，類目定義與傳統speech departments 課程設計較接近的「演辯與語藝研究」（Speech and Rhetorical Studies）（屬於「英語與文學」學門），成長則遠不及「一般傳播學」類目。雖然「一般傳播學」類目的明確內容仍有待更詳細的比對，Craig以其任教科系（Dept. of Communication, U. of Colorado at Boulder）為例指出，當原本屬於此一科系的戲劇、語言病理與廣播陸續脫離後，學系名稱改成Dept. of Communication，儘管課程內容仍舊比較接近「演辯與語藝研究」類目，但卻因為學系名稱的緣故而被歸入「一般傳播學」類目。Craig與 Carlone據此大膽推論，在美國“communication”一字已逐漸成為傳播學領域中一個主要的知識分類類目（central organizing category of knowledge），廣義地囊括所有原本分屬speech communication領域與mass communication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上述U. of Colorado at Boulder的情形只是眾多類似實例之一，簡略瀏覽NCA 1996年完成的「傳播學博士學程評等」調查中所包括的68間大學的傳播科系名稱（"A study of the reputations of doctoral programs in communication," 1996），不難看出“communication”一字在美國的強勢地位。在這份調查名單中，多數傳播學系的名稱為communication 或communication studies，極少數的名稱為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Ohio U. 與 Bowling Green State U.）、human communication studies（U. of Denver 與 U. of Howard）、rhetoric（U. of Minnesota at St. Paul 與 U.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communication arts（U. of Wisconsin at Madison）、communication sciences（U. of Connecticut），而仍有12所大學的傳播學系（後來U. of Indiana at Bloomington 改成Dept. of Communication & Culture，Temple U. 則從Dept. of Rhetoric & Communication 改為Dep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保留speech communication的名稱，其中不乏知名學府（包括U. of Texas at Austin、U.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 of Minnesota at Minneapolis、U.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U. of Washington、Pennsylvania State U.、Southern Illinois U.）。再細看各系的課程內容，除了U. of Minnesota at St. Paul 與 U.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僅提供語藝課程外（課程內容與科系名稱名實相符），多數學

校（20餘所）所提供的課程內容已呈現整合speech communication 領域與mass communication 領域的面貌。換言之，歷經八十餘年的發展，speech departments從早期對人類演講、辯論與戲劇等表達藝術活動的關注，到研究發生於各種面對面溝通情境中溝通行為的speech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s，近期更演變成觸角延伸至所有重要的人類溝通行為（包括中介與無中介溝通）的communication 或communication studies departments；1997年SCA易名為NCA 正是反應上述speech departments八十餘年的發展結果。

無疑地，美國傳播學領域目前的發展會在國內引發一些「名」/「實」問題的討論，或許會有人將關注的焦點鎖定在我所任教的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因為敝系英文名稱中出現“speech”字樣）；但我個人認為，美國的發展衝擊所及應該是全面性的、涵蓋國內所有的傳播科系，因為SCA再度易名係有鑑於美國傳播學次領域間界線的模糊化或學術合流時代之來臨，並非意味一個傳播學次領域（speech communication）之式微或一個傳播學次領域（mass communication）之壯大。誠如華人傳播學者馬成龍所言（1999: 253），SCA易名之舉代表美國傳播學次領域間學術合流之確立，speech communication摘下“speech”的帽子，mass communication當然也不需要再戴著“mass”的帽子。換言之，無論是戴著“speech”或“mass”帽子的傳播人，面對現今美國傳播學領域內的整合趨勢，都無法置身事外。

不過，美國傳播學領域目前的整合新貌是八十餘年的發展結果，另外也受到美國國內經濟景氣情況的影響。反觀國內傳播學領域的發展，似乎並不存在學術合流之迫切性，speech communication與mass communication科系間的對話機會也十分有限。因此，在促使學術合流的外來壓力不存在，自發性改變的意願也很低的情況下，恐怕國內speech communication與mass communication科系短期內仍會各自戴緊自己的帽子。儘管如此，美國傳播學領域的這股「整合」風潮仍然對華人傳播學界產生「震撼教育」的效果，紛紛著手進行各自領域內的健康檢查，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從八十七學年度試行「學程制」，當可視為對此趨勢的率先反應（王石番，1998）。

### 參、口語傳播教育之新內涵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Dep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成立於1992年，時值美國傳播學門開始急速蛻變的90年代初期。國內在這個時候設系，好處是社會科學取向之「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課群與人文/批判取向之「語藝研究」

(speech & rhetorical studies) 課群在美國speech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s中已取得很好的平衡發展，進行課程規劃時，很容易就能在既有的基礎上，依國內環境之需求，型塑國內口語傳播教育之內涵。然而，科目取捨之間難免會受到規劃者學術傳承背景 (rhetoric路線或 communication路線) 的影響，加上近幾年來美國傳播學門內部的急遽變動，世新口語傳播學系成立七年以來不曾修改過的課程設計 (過去幾年都僅止於一、兩門科目的更動或修課年級的調換)，亟需放在全球傳播學發展新趨勢的大架構下，重新檢討，以求健全學系體質。

從八十七學年度起，本系「課程委員會」自NCA網頁上所提供的傳播科系清單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98) 中，挑選50所設有博士學位學程之美國大學傳播科系，分析、比較各校大學部課程內容，其中包括國內傳播學界較熟悉之U. of Arizona、Arizona State U.、U. of California- Berkeley、U.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U. of Colorado-Boulder、U. of Denver、U. of Illinois-Urbana Champaign、U. of Indiana-Bloomington、U. of Iowa、U. of Maryland-College Park、Michigan State U.、U. of Minnesota-Minneapolis、U. of Northwestern、Ohio U.、Ohio State U.、U. of Oklahoma、Pennsylvania State U.、U. of Purdue、U. of Southern California、Southern Illinois U.、SUNY-Albany、SUNY-Buffalo、U. of Texas-Austin、Texas A&M U.、U. of Washington、U. of Wisconsin-Madison；其次，參酌美國傳播學者對學門現況之檢討與未來發展所提相關論述 (譬如，Daly, 1999；Deetz, 1994；Powers, 1995；Prusank, Kelly, Duran, 1994；Wartella, 1994；Zarefsky, 1993)；此外，也考量世新大學傳播學院未來可能進行之整合趨勢。得出以下四項修改本系現有課程內容之參考準則：

#### 一、平衡「傳播研究」科目與「語藝研究」科目分配比例

根據傳播學者Jesse. G. Delia (1987：81-82)之分析，1960年代起，speech departments便由社會科學取向之「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與人文/批判取向之「語藝研究」(speech & rhetorical studies)學者“共同看護”(joint custody)，長期互動下來，「語藝研究」學者轉型成“質性/解釋派社會科學學者”(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tists)，「傳播研究」學者也比其它學門的實證研究學者更能肯定質性研究的優點。因此，美國的speech departments一個常見的特色是，「傳播研究」科目與「語藝研究」科目很平均地共存於同一科系中。

本系「課程委員會」視此為speech departments的一個優良傳統，也希望能看到

這個傳統在本系課程內容中突顯出來。然而，本系現有課程內容與上述傳統仍有一段距離，尤其是一些較具代表性的「語藝研究」科目（譬如，「語藝理論」與「語藝批評方法」），都尚未排入本系課程當中。其次，大一下3學分的「演講學」訓練略顯不足，希望能將另一門「政治演說」選修科目加以轉型或另設「演講寫作」，以培養學生撰寫專業性演講稿件的能力；現有的「語言與領導藝術」課程則將導向對國內政府高階領導人物政治語藝特質之探討，以填充國內相關文獻之空缺。此外，預定將原本3學分3小時的「辯論學」改為3學分4小時，增加1小時的實習課程，目前暫定以舉辦高中盃辯論比賽型式，幫助學生熟悉辯論比賽流程。

## 二、加強「語言學」基礎課程

在一篇探討「語言」（language）與「傳播（或比較接近英文原意之“溝通”）」（communication）關係的文獻中，傳播學者Donald G. Ellis（1993）強調，瞭解語言之「結構性」特質是進一步瞭解語言之「策略性」與「功能性」特質的基礎，前者是「語言學」（linguistics）的研究目標而後者則是「傳播學」（communication）的研究對象。雖然對一個傳播科系的學生而言，應該同時具備與語言之「結構性」、「策略性」以及「功能性」特質相關的知識；但是，一般傳播學系的課程設計多半偏重探討語言之「策略性」與「功能性」特質，而忽略語言之「結構性」特質。這種過度偏重探討語言之「策略性」與「功能性」特質的課程安排，使得傳播科系訓練出來的學生就像大多數只會開汽車，但不知道引擎蓋下啟動原理的大眾一般，知其然但卻不知其所以然，缺乏紮實的基礎。本系課程也不例外，探討語言之「策略性」與「功能性」特質的課程顯然比例過高。

爲了改善上述缺點，本系已在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課程中，加入「語言學概論」；雖然是一門選修課，但選課情況十分熱烈，顯示本系學生的確有這方面的學習需求。有鑑於此，本系「課程委員會」也考慮增設「語言與溝通」（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科目，以便帶領本系學生熟悉「語用學」（pragmatics）、「語言心理學」（psycholinguistics）與「語言社會學」（sociolinguistics）等領域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同學瞭解人類大腦的構造與社會屬性（年齡、性別、社會階級、種族、宗教派別）對溝通行爲的影響。此外，以分析人際互動行爲（interact）爲主的「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也是瞭解人類溝通行爲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課程，課程中將介紹互動分析法（interaction analysis）、對話分析法（conversation analysis）等方法。

### 三、突顯與社會公共議題之關聯性

或許因為長期受困於外界對傳播學門學術正當性的質疑，許多傳播學者開始警覺到，傳播學者過於膽怯或小心，導致在很多重大的社會議題上幾乎都聽不到傳播學者的聲音。現任的NCA會長John A. Daly (1999) 曾痛心她表示，傳播研究的重要性雖然已經很明顯，還是有很多傳播學者甘於將自己視為學術界的「二等公民」，不敢大膽地與大眾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已卸任的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會長Ellen Wartella (1994) 更直接地指出，傳播學界到處充斥著缺乏政治敏感度的學者，使得傳播科系經常成為「校園政治」的受害者。她呼籲傳播學者必須將研究的觸角伸入重大的社會議題，以便提昇傳播學者的社會重要性、洗刷「缺乏關聯性」(irrelevance) 的污名。Wartella表示，其實許多大眾所關心的社會議題都離不開溝通，譬如，個人日常生活品質的提昇、民主政治品質的改善、新興傳播科技對社會的衝擊、公衛議題的宣導等，只是傳播學者必須設法找出這些議題中，溝通理論的著力點在哪裏。

為了回應Wartella與Daly的呼籲，本系已在八十七學年度下學期課程中，加入「族群關係與溝通」，希望能從跨族群溝通(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理論的角度，開始檢視每次國內選舉便成為刺激選民情緒的「省籍情結」或「族群問題」；與此議題相關的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 等「質性研究方法」也是下一個學年度欲增設的課程。其次，新的學年中也會增加「健康傳播」(health communication) 課程，探討與民眾生活品質息息相關的醫病溝通研究(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再者，以培養訊息內容設計能力為課程教學目標的「公共宣導研究」(public information campaign)，將分別探討小型、中型民間組織宣導個案與政府機構衛生教育宣導個案。除了增加緊扣社會議題的科目外，系上專任老師將協力指導大四「畢業專題研究」之修課學生，實際研究與社會議題相關的題目，在每年五月的校內論文發表會中呈現研究結果。

### 四、設計整合性課程

傳播學門內「學術多頭馬車」的亂象一直為人所詬病，許多學者(陳國明，1999；Reardon & Rogers, 1988; Swanson, 1993；Wartella, 1994；Zarefsky, 1993) 都認定此種亂象已嚴重妨礙學術發展。為了提昇學門的整體性，以傳播活動或現象組合不同科系課程之「學程制」是一種方式；另外一種可以嚐試的方法是，融合不同溝通情境於單一「整合性課程」，譬如，有些學者突破「人際溝通」與「組織溝通」間之



藩籬，設計一門探討家庭（或私人）生活與職場生活如何相互影響之課程（Prusank, Kelly, & Duran, 1994）。其次，上述本系欲新增之「語言與溝通」科目也是屬於「整合性課程」，因為課程設計的目標便是嚐試將「語言學」與「傳播學」間的關聯性，放在同一門課中來探討（Ellis, 1993）。此外，本系「課程委員會」也發現，美國某些傳播科系中所安排的「故事演講術」課程，應該可以用來培養記者透過SNG播報新聞的能力，以提昇現場即時播報內容的組織性與播報過程的流暢度，這樣的課程設計也是整合speech communication與mass communication的一種可能方向。

## 肆、結語

大幅度地修改課程設計通常是不被鼓勵的，因為它是對現況的一種顛覆，反對的聲音可能來自學校行政單位、系上的老師以及系上學生，過程往往十分漫長與艱辛。不過，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很幸運，這次的課程修改並沒有遭遇太多的阻力。因為無論是教學或研究，成嘉玲校長都給予每個科系很大的自由度；其次，口語傳播學系是一個很年輕的科系，系上並不存在沉重的「文化」包袱，五位專任老師（除了我之外，另有江中信老師、馬國光老師、游梓翔老師與劉文英老師）間很容易透過誠摯的溝通，便在很多重要的議題上達成共識；此外，系上學生與老師間的互動沿襲校內民主精神，學生的意見也都能被反應在系上的相關決策上，這次所進行的課程修改，很多地方都融入幾年來歷屆學生所提出的建議。不過，我十分認同政大新聞系潘家慶老師的論點（潘家慶，1995），除了檢討課程設計外，更要強化實質的教學效果。畢竟修改課程設計的最終目標還是希望學生能受益，新穎的課程設計若不能搭配有效的教學方法，最後也都只能算是「紙上談兵」。

## 參考文獻

- 王石番（1998）：〈回顧與展望〉，《傳播研究簡訊》，15：1-3。
- 馬成龍（1999）：〈傳播學在美國的發展：從SCA易名為NCA談起〉，《新聞學研究》，58：245-256。
- 陳國明（1999）：〈傳播學研究概觀〉，《新聞學研究》，58：257-268。
- 潘家慶（1995）：〈第一等大事，豈可等閒視之？〉，《傳播研究簡訊》，10：1-2。
- A study of the reputations of doctoral programs in communication. (1996, April).

-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natcom.org/Comprog/reports/repstudy.htm>
- Bochner, A. P., & Eisenberg, E. (1985). Legitimizing speech communi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coherence and cohe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T. Benson (Ed.),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pp. 299-321.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 Chesebro, J. W. (1996). Why we need to change our name to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pectra, 32(11): 2&22.
-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98, September). (On-line). Available: Available: <http://www.natcom.org/Comprog/departments.htm>
- Craig, R. T., & Carlone, D. A. (1998).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U. S. higher education: Towards re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7(1): 67-81.
- Daly, J. A. (1999). Communication matters. Spectra, 35: 2&12-14.
-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20-98. Newbury Park, CA: Sage.
- Deetz, S. A. (1994). Fu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challenges, the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contribution. In S. A. Deetz (Ed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7, pp. 565-60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llis, D. G. (1993).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2(1).
- Powers, J. H. (1995). On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4: 191-222.
- Prusank, D. T., Kelly, L., & Duran, R. L. (1994). Interpersonal/organizational tensions: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3(4): 322-329.
- Reardon, K. K., & Rogers, E. M. (1988). Interpersonal versus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 A false dichotom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284-303.
- Swanson, D. L. (1993). Fragmentation, the field, 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163-172.
- Wartella, E. (1994). Challenge to the profess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3(1): 54-62.
- Zarefsky, D. (1993). Does intellectual diversity always serve us well? Spectra, 29: 2-3.